

特稿

# 从文字起源看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刘正成

**摘要：**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同一起源的两大体系。大量关于文字刻划符号的现代考古学资料研究，《史记》记载以炎帝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江海文明，和以黄帝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的内陆文明，是融汇形成殷商甲骨文为成熟汉字的两个子系统。仰韶文字符号属于内陆系统，三星堆和东夷文字符号同系于江海系统，清晰可见同属于表意为特征的成熟汉字的血缘关系和融合历程及其原生性。它与表音为特征的西亚北非古文字系统不同，但其历史同样悠久。

**关键词：**东亚文明原生性 炎黄文化 汉字起源 东夷族徽 三星堆 羊图腾 图腾与文字 仓颉造字 古羌文与古彝文 甲骨文

## 一、炎黄文明与夷夏之辨

两种人类和文明起源说 人类起源于非洲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在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原始人化石，并以当地名称命名为『蓝田人』和『元谋人』。元谋人到底比现代人提早了多久出现呢？答案是一七〇万年，比非洲原始人的出现更早，因此也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

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里，人类是单地起源的。既然人类是单地起源，那么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类都是从这个起源地迁移扩散过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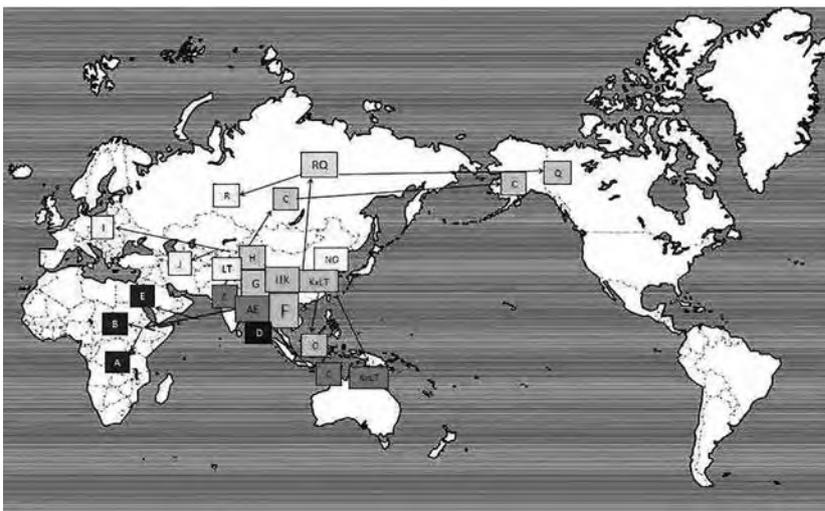
遵循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的东亚起源说，认为人类起源于一七六〇万年前，现代人起源于东亚并扩散到世界各地。

遵循分子钟理论和中性理论的非洲起源说，认为人类起源于七百万年前，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

在现代人之前的祖先，大概率要么在东亚，要么在非洲。所以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或是从东亚，或是从非洲大陆迁移扩散到世界各地。

按照目前的古DNA检测结果，现生人群的基因都来自于东亚。而且东亚古人类化石表明，东亚地区古人类是连续演化，没有间断的。所以人类应该是起源于东亚的。按照东亚起源说，现代人迁移路线图如图一。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观点认为：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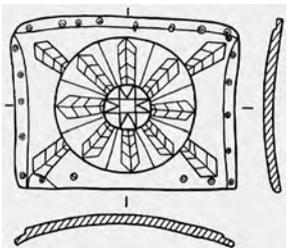
图一：现代人Y染色体出东亚图

内尚不能得到圆满回答。他说：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其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可以说，我们站在两种人类起源论的选择性与可能性上。

夷夏东西：重新认识中华远古文明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考古学者、古文字学家、《中国书法全



图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玉版



图三：玉版描摹图，同于古彝语“八卦”



图四：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



图五：来自良渚等地出土文物上的图像



图六：中国东部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的族徽



图七：至今书法家仍使用的纳西族文书（局部）

集·甲骨文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一再提出：从文字起源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认识，以为那时的文字是一统的，文化也是一统的，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特别是早期文字所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冯时认为：『地中』变迁暗藏着夷夏格局变化的玄机。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在讲座中，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今天不管是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为此，他又举出三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首先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块玉版（图二、图三），距今约五千三百年。这块玉版藏于一件玉龟之中（图四），内外有四重图像，最中心是一个指向四方的八角图形。冯时认为，这就是汉人常说的所谓『龟书』或者叫『洛书』。通过大量搜集和研究新石器时代这种特殊八角图形后（图五），他发现，这些考古材料的

出土地点，都在太行山以东，北至辽河下游，向南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而太行山以西至今未见一件。并且，这种图像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傣族等风俗里还大量存在，有些图像还配以八卦，彝语把八卦称作『八角』。因此，通过考古材料，太行山以东的上古文明可以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建立某种联系。

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文化面貌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有着极大不同，冯时认为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

图六中的这些图像对很多考古学者来说非常熟悉，它们像一个斗魁，中间有突起。甚至还有有一种『族徽』符号，也是下面一个斗魁状的脸，上面中央突起。这在东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

冯时认为这即是汉文典籍里描述的『璇玑』，也就是古人认为的『天极』，不仅今天考古发现有大量这样的遗存，其文献证据也记载在《周髀算经》中。所谓天极，实际就是北天之中不动的那个点（北极星），北斗星会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规划出一个圆形的空间，这个空间古人称为『璇玑』，北斗七星中有两颗即叫『璇』

和『玑』。但是，今天我们从华夏族遗物中很难寻觅到这种中央凸起的『天极』文，而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图七）里居然还有，比如『天』字，正是这种中央突起造型。

这里所说的『夷』就指同属江海文明的巴蜀文明与东夷文明，它早于『夏』，并且与内陆文明的『夏』一同构成中华文明与文字的来源。而这个『夷』字与四川凉山彝族的『彝』字是同音同意的，可以说，夷和东夷是密切相关的，『夷』即是『彝』。甲骨文（图八）云：『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役。』《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提到西风神『夷』，《山海经·大荒西经》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夷』是『石夷』。

由于少昊之子『般』，发明了弓箭，因此所有鸟图腾的人都把背弓带箭看作为时尚。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东方，因此称作『东夷』。（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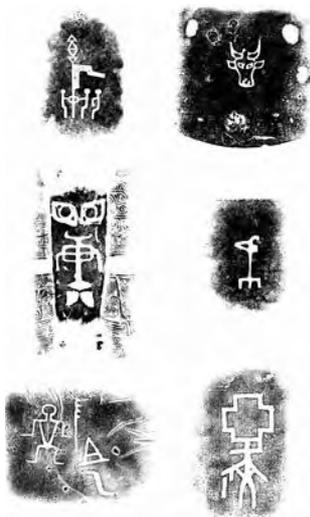
黄河基本上是一条内陆河，它的航道是季节性和断续性的，如果说华夏是以中国的中原黄河为中心的大陆文明的话，夷就是以航道通于大海的长江流域并延及山东、苏北为中心的河海文明的代称。

根据地球大陆漂移的考古学判断，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和以北非西亚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在数十万年时间内，是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的，他们有相互的影

响，但各有独立的文明体制。从文字和语言学的视角来阐述，东方主流的表意文字与西方主流的表音文字，各自构成了文字与文明的不同体系。中国由夷和夏各自东西的时代叠加完成的汉字，是在汉藏语系中形成的近万年的汉字与书法的悠久文化传统。所以，我们的三星堆

和金沙遗址文化的研究和讨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认知基础上的，它与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字与文明是否是『西来说』的争论毫无关系。  
『夷夏东西』之说最早由傅斯年提出。他认为中国所谓『南北』格局是比较晚近才形成的，而在夏、商、

周三代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



图十七：商代青铜器上的族徽合体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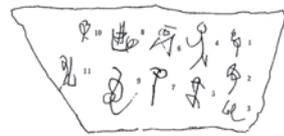
图十八：尼罗河某神庙古埃及石碑上的文字符号：男人和女人



图十九：两河流域的楔形文的词组性文字符号



图二十：山东邹平出土的龙山文化陶文



图二十一：描摹图



图二十二：古彝文直译：鹰眼守家  
意译：鹰眼守护疆域



图十二：大口尊上的东夷族徽



图十三：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大口口文化文字符号



图十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



图十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



图十六：殷墟遗址出土司母辛方鼎的  
词组符号族徽



图八：甲骨文

图片	印章文字	甲骨文	金文	现代汉字
				夷

图九：哈拉帕印度文字“夷”与甲骨文、金文、现代文字对比表



图十：李白凤《东夷杂考》



图十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  
大口文化大口尊之一

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 二、用文字形态对东夷文明与巴蜀文明的互证

郭沫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符号分成两大系统：刻划符号和图形符号。前者以半坡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点线式的几何形符号；后者以大汶口遗址的陶符为代表，多为用线条勾勒的图形符号（这两类符号，不尽出于刻，也有用毛笔、硬笔书写者）。他把这两类符号称为指事、象形两大系统，分别当作汉字的两个源头。他认为，商代有两种族徽，一种是『刻划系统的族徽』，包括今所谓『数字卦』；一种是『图形系统的族徽』。这两种『族徽』即源自陶器上的这两类符号。

冯时认为，古彝文里藏着『夷夏东西』的密码。他用古夷文所能识读的山东邹平丁公陶文，以及更早考古学时代的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的甲骨文刻划符号，证明了『夷』的文明和『夏』的文明是先后和同时发展的中国文明构成的两大主流结构。于是，以古彝文释读的三星堆的图章文字，从而证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巴蜀文明是与夏文化并行而最终合流的夷文化的真实存在。下面，我就莒县陵阳河出土的二十个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刻划符号不是单个文字，而是文字前奏的东夷族徽的研究意见，然后重新阅读了冯时的许多关于古彝文和东夷文明的文章和演说，向大家报告我的心得体会。

**文字符号的初生与东夷族徽** 老一代学者李白凤著《东夷杂考》（图十）中提出，史前时期各民族是混淆不清的，主要表现在：一、东夷是比较不混沌的东方各民族的『土著』；二、夏代以前是炎帝族、黄帝族迁入的『外来户』；三、夏代各种原因迫迁而来的『移民』；四、商代成汤八迁中留而未去的『遗民』。东夷各民族从人种学来说是组成汉族的主要成分，在古老文化的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

我认为，东夷民族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崇拜太阳神，以羊为图腾的长江流域炎帝族，被后来居上的中原黄河流域的黄帝轩辕氏所融合，故我们有炎黄子孙之说。

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图十一）有二十个，这个尊上的刻划符号，于省吾先生考释为『旦』字，日形、云气、五峰山形，三个部首的会意字。唐兰先生考释为『日、火、山』为一字，或简体为『灵』。冯时认为属于古彝文『天』『地』合文，并认为结构严谨，刀法劲峭，反映出刻划者极高的艺术造诣。而我认为并非一个字，而是东夷民族的族徽（图十二）。因为文字出现以前，相传是结绳记事。这种记事是一个结记录一件事，而非一个字，这个符号是一个词组。这一点与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相近，一个括号里面是一个词组。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口尊符号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字，所以无法用单字来识读。

这也是我对文字起源的一个重要观点：东西方所有文字均不是以单字或单词被发明和使用的，而是由一组有意义的字组和词组发明后，才逐渐从思维和语言的混沌中找到字与字、词与词的形、音、义，及具有逻辑意义的语法关系，从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再分别走向表音文字和表义文字的不同语言和文字系统。

所以，我认为大口尊上的三个文字符号不是一字一音，而是一个汉字符号词组，它是表达了太阳神崇拜的东夷民族具有宗教意义的族徽。这个符号也多次出现在同属江海文明的苏北地区。所以作为距今约六五〇〇年—四五〇〇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文字尚处于符号阶段。在二十多个大口尊上，有许多表意的符号，都是与太阳神崇拜有关系的用于祭祀的表意符号。（图十三—图十九）

**古彝文对东夷文的释读：邹平丁公陶文** 冯时作为考古学家和书法家，在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中对史前即远古文字与书法选取了八件作品，对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甲骨文（前一一〇〇年左右）之前约八〇〇〇年左右时间，建立了一个文字与书法发展链

条，并作了严密的考释，作为他的中国远古文字与书法的学术观念。同时，这些观点也向我们提出了思考的问题，有待大家去跟进追寻！

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香港）赵德静的《古彝文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一文。这是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权威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经过多次进行研讨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上述结论是否合理暂且不表，先说一九九一年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被挖掘出土的丁公陶文（图二十），考古学家判断其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这十一个符号显然是一段文字，它与甲骨文很像，但考古学年代起码比殷墟甲骨文出现早了近千年，但其文字无法释读。冯时用古彝文解读了陶片契刻五行十一字（图二十一），而且左下边留有残字的笔画，说明陶片上原有文字并不止十一个。十一字呈现完整的书面语形式，因此其性质属于文字无疑。

这些文字的形体结构与商代甲骨文明显不同，这意味着其与汉字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与古彝文的对读结果显示，二者的构字特征完全一致，证明了丁公陶文应该属于东夷文字，并与古彝文为同一文字系统。他利用古彝文解读，其内容汉译为：『魅卜，阿普读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文字结构严谨、刀法流畅，是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所见存字最多的文字作品。

**古彝文对三星堆图章文字的释读**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破译的印文『鹰眼守家』（古彝文直译），意译：『鹰眼守护疆域』。（图二十二）

绍兴大禹陵的《响唳碑》又称《禹王碑》，其字



图二十三：三星堆遗址科斗文龙玺印拓

图二十四：科斗文龙玺



图二十五：绍兴大禹陵《岫嵎碑》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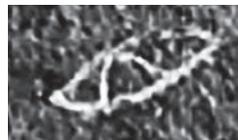
图二十六：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



图二十七：远古印“商玺”之一



图二十八、图二十九、图三十：三枚远古“商玺”印蜕



图三十一、图三十二：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龟甲及局部放大

与三星堆科斗文龙玺印拓文字应属同种文字。而古彝文则与《仓颉书》《夏禹书》相关。（图二十三—图二十五）

安诺石印上的东夷符号与『商玺』二〇〇〇年六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希伯特博士到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一处多间土坯房遗址下面发现了一枚有光泽的黑玉印章（图二十六）。印面呈正方形，背上有横置的瓦形钮，边长略小于一英寸（一英寸约2.54厘米）。印面刻有五个符号，笔画里有红色痕迹。对与这枚印章同时出土的遗物进行碳十四检测，年代为公元前二二〇〇年。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二日，希伯特博士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对这枚石印进行了介绍，他『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这枚石印的发现，引起中外学术界的热议讨论和争议。这就『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因为这枚安诺石印的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二二〇〇年，时间上早于三枚未释读的字符符号的『商玺』。商代一般来说约公元前一六〇〇年—公元前一〇四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称殷商，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这样，希伯特博士对安诺石印的确认岂不是直接指明了它是早于商代的？这个所谓『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则暗示中国商代古文字有可能源自中亚或西亚。

当时，中国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得知安诺遗址出土石印的消息后，即查阅《纽约时报》的报道，撰写《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一文，发表在二〇〇一年七月四号的《中国文物报》上。面对学术界的诸多争论，他又撰写《安诺石印的启发》一文发表于同年的《中国书法》杂志上。他指出，这件石印的形制，与西亚、印度河谷等地的印章，包括铃印的、滚印的在内都不相似。看其正方的印面和类于瓦钮的印钮，确实很像年代远在其后的中国印玺。符号笔画里不知怎么造成的红色，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就其年代而言，比现已发现的最早甲骨文也早了许多。安诺石印上的符号，均由直线笔画构成，姑且以笔画连接为标准，分解为『五个』。铃印成的顺序应该是『五』『一』『己』『木』『丿』。李学勤发现这五个不同形状的符号，都可以在属于东夷文明的大汶口史前陶器符号中找到。如今看来，他的见解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极大的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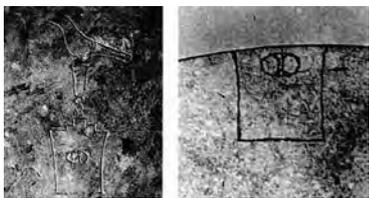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仔细看看二十世纪发现的三枚被称为中国古代印章之源的『商玺』（图二十七—图三十），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晚于安诺石印时代的商代呢？显然，经过二十世纪的许多古文字学家的努力，冠名为『商玺』的这三枚远古石印仍未得到公认的识读。我认为，安阳殷墟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而这三枚『商玺』并不属于商代。将它与后来三星堆出土被古彝文所识读为『鹰眼守家』四字印的符号形态相比

较，会发现这三枚『商玺』极有可能不属于商代，而且早于商代，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图章文字属于同一文字系统和文字发展阶段的文明遗存。

古彝文对舞阳裴李岗文化甲骨文释读 迄今所认为中国文字第一字为『目』（图三十一—图三十二）。冯时认为，龟甲上刻一字，字形结构与商代甲骨文『目』字相似，可知字形取象于眼目。相同的字形又见于良渚文化礼天的玉璧之上，因此据甲骨文将此释为『目』则殊难理解。事实上贾湖文化应属东夷文化的系统，故其文字也非为汉字，而应为古代夷文。

今存古彝（夷）文『吉』作『目』，与贾湖龟甲文字字形全同，所以此龟甲文字当释为古彝文『吉』（图三十三—图三十四）由此看来，古彝文能释读的这些考古学资料的时间上限，应该在新石器早期到旧石器晚期的文字符号，例如河南舞阳裴李岗文化遗址的甲骨文刻划符号。

三、古彝文的研究与殷墟甲骨文溯源 『古彝文』可以称为『古仓颉文』？古、今彝文有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因为『古彝文』是表意文字，今彝文是用拉丁文拼音所派生的表音文字。正如西夏文和日文均派生于汉字，而西夏文和日文不能称之为新汉字一样。所以，我认为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前，是否可以暂且命名『古彝文』为『仓颉文』？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表示：四川彝文是



图三十三：与东夷文字同一系统的良渚文化玉璧文字“吉”



图三十四

玉板文	古彝文	规范彝文	古彝文译意
			要坐此神船，
			去找库土人。
			雁鹿高层行，
			蛇神头迹。
			库人初呼魂，
			要解洞弯处，
			龟朔望颂龟。

图三十五：古彝文汉白玉石碑



图三十六、图三十七：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羊尊



图三十八：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四羊方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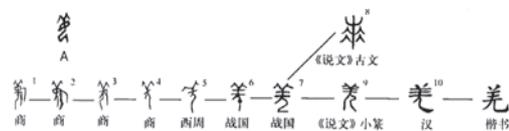
图三十九：四羊方尊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四十：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羊”字



图四十一：甲骨文中“羌”字



图四十二：“羌”字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羊”字的发展变化中而来

音节文字，云南彝文是混合文字，表意+表音，周先生称之为“音意文字”。周先生所谓四川彝文即是今彝文，而云南彝文即古彝文；古彝文是表意文字，今彝文是表音文字。

古彝文也作古夷文，通常称为传统彝文或老彝文，是相对于四川凉山地区《规范彝文》，即今彝文而言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现行的文字称为《新彝文》。而云南、贵州广大彝区反而流行使用的彝文是彝族千百年来使用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它不是借用和模仿汉字的产物。而《规范彝文》是用拉丁文对传统彝文改造造成的表音文字。这一点有点像拉丁文对汉字的拼音方案。（图三十五）

我的问题是，这个表意文字的古夷文可以释读同样属于表意文字的河南舞阳裴李岗文化的甲骨文、山东邹平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三星堆图章文字，同时又与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族徽的天地合文等符号同形同义，这种关系是否说明它与东夷文明或称东夷文是一脉

相承的？

关于古彝文的国际会议主流认知，它有八千年至一万年的历史，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其实就是旧石器时代相近中国伏羲时代经过黄帝仓颉时代，直到商代晚期甲骨文之前中国上古时代表意汉字的雏形滥觞，是中国商代甲骨文字的来源之一？而今彝文如同契丹文、西夏文、巴思八文、韩文、日文等一样，是借助拉丁文拼音所改造的古夷文后变成一种表音文字？严格说来《古彝文》并非今彝文，更非彝文。而古彝（夷）文更应该跟《仓颉书》《夏禹书》是一脉相承的文字，它在出现之初是以姜、羌为姓氏的羌人为主体的三皇时代文字主要形态之一。直到彝族出现时，这种文字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黄帝时代后，由《黄帝之史仓颉造字》所改造过的《古彝文》，而因此暂且可称为《古仓颉文》，然后衔接商代甲骨文。

李零在《汉字起源是个谜》中说：『现在讲汉字起源，学者多借鉴苏美尔、埃及、玛雅的古文字，立说于

比较研究。苏美尔楔形文字，进化分四阶段：陶符—陶筹—原始楔形文字—成熟楔形文字。这一进化模式超越了定义说和突变说。受这一进化模式启发，很多学者相信，殷墟文字之前肯定有一个准备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有各种推测。陈梦家认为，至少得上推五百年，即至少在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而我认为，这个准备过程更为漫长。而《古彝文》——《古仓颉文》则是这个漫长过程中已发现，甚至以原生态而传承至今最为重要的过程之一。

现在，我们要找到早期文字的过硬证据，只能从已知的文字体系反向逆推——用饶宗颐的话讲，就是『以后证前』。中国史前的刻划符号，贾湖遗址所出（约前六〇〇〇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前四五〇〇年），裴锡圭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前二七〇〇—前二五〇〇年），裴锡圭叫乙类符号。郭沫若认为，甲类符号早于乙类符号，是最早的文字。裴锡圭相反，认为甲类符号

不是文字，乙类符号记名物，才更接近语言学家定义的文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曾一度把大汶口陶文的族名符号视为类似商代族徽的符号。虽然后来他又放弃此说，认为两种符号都不是文字。他说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约在夏商之际。

这里并非通常认为的夏商之际，而是约公元前三千纪的中期，也就是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可见他是拿乙类符号作原始文字的下限，把成熟文字的出现放在这一时间后。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前二三〇〇—前一一八〇〇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二〇〇〇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我认为这种看法较为谨慎保守，『古彝文』——『古仓颉文』当然应该称为原始文字。这个问题，随着当下现代考古学有如泉涌般的发现，我想应该进一步借助于殷墟甲骨文成熟后形成的汉字所记载的上古历史，结合『古彝文』——『古仓颉文』或『夏禹书』的进一步研究，寻找证明这种传承关系的更多证据，在学术界进



图四十三：甘肃西河县仇池山九倒拐山路



图四十四：“人文始祖”匾 现存于仇池山伏羲庙



图四十五：伏羲庙壁画（部分）



图四十六：伏羲庙壁画（部分）

行更为广泛深入的多学科——古文字学、甲骨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献学的讨论。如果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论证，那么殷墟甲骨文及远古文字的研究是否将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由三星堆青铜羊尊和『羊』字来看三星皇时代 根据《史记》记载，所谓『三皇』，即指伏羲、女娲、神农。后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从三星堆博物馆所陈列的羊尊和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四羊方尊来看（图三十六—图三十九），羊正是三皇时代的图腾。而黄帝以后的民族图腾便演变为龙图腾，然后有『黄帝之史仓颉造字』之说，商代大多数青铜器的纹饰即由羊演变为夔龙、夔凤，所以我们有『龙的传人』这个说法，掩盖了我们理应是『羊的传人』的文明历史。所以，我们首先说说『羊』字在汉字系统中的价值体系。

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即有『羊』字（图四十）。从『羊』字的字体演变，可以看到羊与上古先民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羊承载着艺术，孕育着文化，象征着精神，伴随着中华民族从蛮荒步入文明，羊影响着我国的文字、饮食、道德、礼仪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羌』字从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羊』字的发展变化中而来，甲骨文的『羌』字有二百多种写法。（图四十一—图四十二）

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羊，祥也。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云：『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因为羊温顺可亲，是一种善良有义的动物。以伺羊为生的羌人的『羌』字即由『羊』字为根所衍生的，所以『祥』『美』『善』『羲』等字都从『羊』。

上古时代三皇中的伏羲与炎帝神农氏的姓氏与民族都与羊字有关。伏羲的『羲』字的源构造：形声，从兮，义声。本义：气。根据隶定字形解释。会意，从羊，从『禾戈』，从『弓』。『羊』本指羊或羊群，引申指『羊群跟人走』『羊顺从人意』。换句话说，伏羲就是牧羊人的首领，他指引着牧羊人的方向。所以从『羊』字衍生出羌人的『羌』。可以说，古羌人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逵夫认为：之所以把『常羊之山』认定为仇池山（图四十三—图四十六），主要理由有三条：其一，《山海经》中对『常羊之山』位置的描述，和仇池山的方位相符；其



图四十七：“姜”字甲骨文

二，常羊山在古代的华阳国内，传说有娇氏女『女登』感应神龙于华阳之常羊山。伏羲有娇氏女所感应的神龙的常羊山无疑就是仇池山；其三，仇池山在古代又叫仇夷山，而『仇池、仇夷』和『常羊』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可以基本确定常羊山就是仇池山。而从九倒拐盘山路登仇池山顶，却见一个绿油油的塬，原来这里有九十九眼泉，还产水稻，十多年前我在塬上就发现过两眼泉。伏羲诞生在这里，在陇原却是一个绿洲。

三皇之炎帝神农氏。《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这个姓氏中有一个『姜』字。『姜』字甲骨文有几种结字（图四十七），前者结构是上『羊』下『女』，后者像戴有羊角的女人。金文字形则沿袭甲骨文，也是女人戴羊头一样的装饰品。

甲骨文字形表明在远古的母系社会中，女人的这种作法就是部落崇拜羊的形象具体的体现。在甲骨文中，『羌』与『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性别上：『羌』指的是男羌；『姜』指的是女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很可能是先有『羌』这样一个部族，后产生『姜』这样一个姓。羌族和姜姓均代表一种图腾风俗，其具体表现就是头戴羊角，以此表明自己与羊这种动物的血缘关系。显然，在从姜姓转为羌即男羌的父亲时代神农氏的炎帝时，他是继承神农氏的伏羲的时代。《说文解字》（卷十二）：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从女羊声。王筠《说文解字句读》：『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这个时代仍然是以羊为祥，以羊为美、善的羊图腾的古羌人时代。所谓东夷人、彝人，均应在同属神农氏的五帝之后，或禹之后的商、周时代之后。这也是山东等地东夷文字可以被『古彝文』——『古仓颉文』所释读的原因。

羌与彝的关系 前面说了以羊为图腾的时代，羊和姜、羌为姓氏的三皇时代。在这个时代，羌人作为华夏民族的华夏，是中国上古时代的主流之一。而处于边缘民族的彝民族与氏羌民族的合流，在商时代及其以后的

时代，彝族人借助古羌语，即古仓颉文、夏禹文所成熟的时代的文字工具，在中华大地西南隅即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带，记载了伟大而丰富的民族文学、诗歌和艺术珍品，并传承至今。作为丰富的由『古彝文』——『古仓颉文』为载体的中华民族在发生期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整理它、研究它。商代甲骨文即有『夷』字和『彝』字，可见一代一代羌族人、彝族人在悠久的历史中赢得了自己民族的光荣。

显然，羌在前，彝在后。前面说了，所谓古彝文可能就是古羌文，或我前面所说『古仓颉文』『夏禹书』的话成立，『古彝文』——『古仓颉文』并没有失传，而是从伏羲画卦和结绳记事创造语言符号开始，即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往后发展，在炎帝时代以后的黄帝时代，经过『仓颉造字』的演变，走向商代甲骨文的成熟时代。

现在，学术界对彝族起源的主流认知是来自北方。根据中国和彝族的历史资料，彝族的祖先与分布在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起源于古羌人。学术界普遍认为，彝族来源于氏羌，即氏羌与早期彝人的融合，而我则从中华文字发源史的立场，提出了彝族人不间断地使用『古彝文』——『古仓颉文』的这个假设，还有待于经过跨学科的研究论证。

大约两千年前，彝族祖先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古彝文文献记载，彝族的祖先钟木鱼有六个儿子，被称为『六祖』。这六个儿子是彝族六个分支的祖先，即乌、乍、布、莫、诺、恒。这些早期彝族以传说故事和诗歌记录为古代文献，即是产生在古羌人时代的历史、文学、诗歌。这样，就让单地起源的东亚文明的历史线条更为清晰起来。因之，由东亚表意汉字为载体所记录的炎黄文明，或华夏文明更符合于人类文明是单地起源的推论。为了证明这个说法，我们围绕当下比较热门的巴蜀文明和东夷文明的讨论，进一步从两个问题去思考追寻。

第一个问题：关于甲骨文作为成熟文字的来源。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上古三皇五帝时代尤其是夏文化时代的文字演变，是不是可以经过古彝文与东夷文明、巴蜀文明的研究来寻找答案？这个问题可以在当下古彝文文献研究中扩大范围，这个范围不仅是与炎黄文明不同的内容，也与其是否有相同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关于古彝文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内蒙古刘志一教授以『世界各地出土的古彝文字和实物为铁证，说明了古彝文——苏美尔文——拉丁文——英、德、法、俄文的历史沿线』。斑远先生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推进，将古彝文和苏美尔文对照研究后得出了古彝文是『西欧六国文字鼻祖』的结论。支持刘志一的还有云南学者戈隆阿宏，他说：『苏美尔（楔）形文字被塞姆人继承下，发展成为西奈字母文字，以后又发展成为比布洛斯、腓尼基字母文字和希腊文字，最后成为拉丁字母文字。因此西方学者认为苏美尔（楔）形文字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西方学者发现我国殷商甲骨文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相似，由此论断：『是中国文明向西亚文明西传的产物。』通过这些文字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刘志一先生的『中国古彝文是西方文字的始祖』的提法，并不为过。』

这种说法在向西方向传播以前，是否需要按学术论文规范，从现代考古学、人类学、古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地拿出研究成果来？这种说法虽然与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里人类单地起源的理论观点相符，但很难得到统一的认可，无助于巴蜀和古彝文研究的传播。

最后，希望读者朋友除了对上述观点提出批评指正以外，还能够对本文提出的中国上古文明研究问题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来讨论和研究。

作者系《中国书法全集》主编  
本文责编：张莉